

發展需求困境與收入差距的累積循環： 一種內生機制*

唐茂華

摘要：本文區分了兩種類型的收入差距——“外生因素決定的收入差距”和“內生因素決定的收入差距”，並集中關注後者，亦即收入差距本身存在一種累積循環的內生機制，初始收入的不均等通過發展需求困境和社會階層分化最終將導致收入差距的惡性循環。縮小這種內生的收入差距的長效機制在於通過政府提供機制化的社會服務來降低發展成本，使最廣大社會群體都能公平享有發展需求和發展機會。

關鍵詞：發展需求困境 社會階層 收入差距 政府職能

一、引言：兩種類型的收入差距

當前，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已經日益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顯問題，並已受到學界和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大量相關研究表明，包括城鄉間、地區間、行業間、不同社會群體間的收入差距急劇擴大，到2000年城鄉居民人均名義收入比率上升到2.46，2003年進一步擴大到3.23倍，2005年仍然維持在3.22倍的高位。用城鄉居民的綜合基尼係數表示，目前我國基尼係數已接近0.47，大大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

收入差距反映的是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亦即不同個人、家庭或社會群體間的相對收入水準。收入差距之所以成為關注的焦點，其原因至少在於兩個方面。首先，從哲學和道德層面來說，經濟平等本身就是十分重要的，減少或消除不平等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沒有理由讓一個人在獲取經濟資源時得到歧視性的區別待遇。其次，更重要的是從功能層面來看，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並由此形成“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惡性累積循環將會影響到其他經濟和社會目標的實現。就中國現實而言，如果說基尼係數0.4的國際警戒線僅是一個先驗的歷史觀察，並不完全適用於評價中國社會貧富差距的話，那麼，近些年中國社會矛盾和群體性突發事件不斷增多、內需持續不足等卻是不爭的事實，而這些正是收入差距問題在經濟發展層面和社會穩定層面的外在表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正視和迫切解決當前中國收入差距問題不是僅僅為了力求倫理公正，而是在於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已經危及到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

唐茂華，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天津社會科學院城市經濟研究所研究人員。

* 基金項目：南開大學“985工程”區域經濟國家社科創新基地項目資助（編碼105212200400007）。

關於中國收入差距形成及持續擴大的主要原因，理論界集中關注了行政壟斷、腐敗等制度性缺陷的重要影響¹。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本實現了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轉變，由此也打破了平均主義的傳統收入分配制度。但是，與這種典型的市場經濟本身所形成的收入差距不同，當前中國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在既定市場規則下自由競爭的結果，而是市場化不足、市場規則的不完善和機會主義的產物。由此，當前收入分配政策的理論論爭及具體實施都主要圍繞如何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改革來破除行政性壟斷、消除腐敗展開。

應當說，這些相關研究和論斷看到了腐敗、行政壟斷等作為外生因素對於收入差距所產生的決定性影響，可稱之為“外生因素決定的收入差距”。但需要指出的是，消除行政壟斷、腐敗等外生因素對於收入分配的負面效應並不是解決問題的全部，實際上收入差距本身存在一種累積循環的內生機制，初始收入的不均等通過發展需求困境和社會階層分化最終將導致收入差距的惡性循環，我們稱之為“內生因素決定的收入差距”，而這一點往往被當前理論界和政府實際部門所忽視。正基於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從動態化的視角探討收入差距惡性累積循環的一種內生機制，並試圖為破解當前收入分配難題提供理論依據和政策建議。應該說，在現實中國社會，行政性壟斷、腐敗等外生性因素是導致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重要原因，但仍不能忽視其內在因素所必然導致的收入差距的惡性循環。

二、個體收入水準與消費需求決策

1、消費需求的分解

依據收入水準的高低，不同產品對於個人需求的優先秩序是不同的，據此諸多學者對消費需求進行了層次的劃分。具有代表性的有貝爾將人的需求分為兩類：需要和欲求。前者是指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感到必不可少的絕對需要；後者是相對意義上的，能使我們超過他人，感到優越自尊的那一類需要；西尼爾將消費品劃分為必需品、場面用品和奢侈品。必需品是指使某人得以保持對於完成其日常工作來說必不可少的健康和體力所必須使用的那些事物；場面用品是指某人為了保持他在社會的現時地位而必須使用的那些事物；某人除此之外所使用的一切消費事物，對於他的健康和體力來說或是對於他在社會現時地位的保持來說不是必不可少的，都稱之為奢侈品。

遵循這種劃分原則，並結合當前我國消費結構的基本特徵，可以將消費需求分解為三個層次（如圖1）：（1）生存需求，意指維持基本生存最低生活標準的必需支出，主要是指農產品等。（2）發展需求，意指作為一個現代社會人，維持現時個人（家庭）³的再生產所必需的支出，主要是指住房、醫療、教育等產品。（3）奢侈需求，意指除基本需求品之外，那些對於生存和發展並不必然需要的所有產品。它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而逐步變化的，因而具有歷史相對性。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手錶、自行車、縫紉機和收音機“三轉一響”的“四大件”無疑是奢侈

品；80年代中後期，彩電、音箱、洗衣機和電冰箱“新四件”取代“老四件”成為奢侈品；90年代至今，汽車及高檔電子信息產品無疑成為新的奢侈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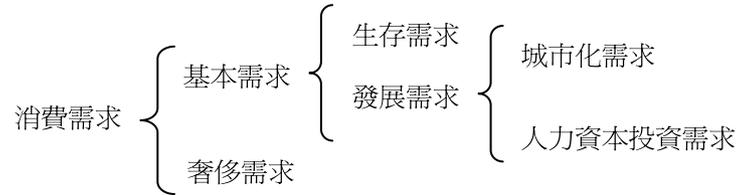


圖1 消費需求的分解

2、收入水準與消費需求決策

消費者的需求決策有賴於其收入水準的高低，據此，本文提出一個理論預設：消費者隨著收入的增加，其消費需求具有層次性，即收入首先用於滿足其生存需求，在最低生存需求完全滿足之前不會將收入用於其他用途；當最低生存需求得到完全滿足以後，再將其收入用於發展需求；只有在其最低發展需求得到完全滿足之後，才可能用於奢侈品需求（如圖2）。用數學表述為，對於任意消費者a：

- (1) 當 $y \leq y_1^*$ 時，全部 y 將被用於滿足生存需求；
- (2) 當 $y_1^* < y \leq y_2^*$ 時，將 y_1^* 用於滿足生存需求，將 $y - y_1^*$ 用於滿足發展需求；
- (3) 當 $y > y_2^*$ 時，將 y_1^* 用於滿足生存需求，將 $y_2^* - y_1^*$ 用於滿足發展需求，將 $y - y_2^*$ 用於滿足奢侈品需求。

其中， y 為消費者a的收入， y_1^* 為最低生存需求成本臨界點， $y_2^* > y_1^*$ 為最低發展需求成本臨界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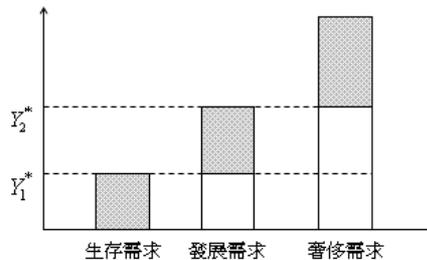


圖2 收入水準與消費需求的層次

三、收入差距的累積循環：一種內生機制

1、社會群體分異：收入差距累積循環的邏輯起點

根據以上關於不同收入水準個體的消費決策，可以將消費者的收入狀況與需求成本的對比關係同其福利狀態聯繫起來。

當 $y \leq y_1^*$ 時，消費者處於絕對貧困狀態。此時，消費者將獲取的全部收入用於生存消費，但仍不能完全滿足其最低生存需求。

當 $y_1^* < y \leq y_2^*$ 時，消費者在滿足基本生存需求的基礎上，將全部剩餘收入 $(y - y_1^*)$ 用於滿足發展需求，但順應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最低發展需求無法得到完全滿足，它實質是指一種“相對剝奪感”。

當 $y > y_2^*$ 時，在滿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和發展需求之後，消費者可以將剩餘收入 $(y - y_2^*)$ 用於奢侈品需求。此時，消費者處於相對豐裕狀態。

由此，根據消費者能否滿足其發展需求與否，可以進一步將整個社會簡要劃分為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兩大群體。其中，將所有滿足 $y \leq y_2^*$ 的消費者歸類於低收入群體，其人口總數量為 N_1 ，平均收入為 y_1 ；將所有滿足 $y > y_2^*$ 的消費者歸類於中高收入群體，其人口總數量為 N_2 ，平均收入為 y_2 。顯然，低收入群體就是那些順應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最低發展需求無法得到滿足的消費者集合。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低收入群體和中高收入群體由於收入狀況的差異，其在需求的滿足程度上存在根本性的差異，前者的發展需求無法得到基本滿足，從而也就無法實現個人（家庭）的再生產，後者發展需求的滿足使之能夠很好地完成自身的再生產過程。低收入群體的這種“發展需求困境”形成了收入差距累積循環的邏輯起點。

2、發展需求困境與收入差距的累積循環

自工業革命以來的兩百多年，整個社會的物質生產能力空前高漲，中國也不例外。如果說前資本主義時期經濟社會矛盾的根本癥結在於物質資源相對匱乏的條件下，統治者強權導致廣大社會群體的生存需求無法得到基本滿足，那麼現代社會矛盾的癥結則在於物質條件已經極大豐富的條件下，市場化“無形的手”使得發展需求品價格過高，進而導致低收入群體發展需求無法得到基本滿足。

在市場交換方式下，“經濟法則”有關商品、勞動、資本等的供給與需求逐步取代了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強制性的社會秩序，發展需求品的市場化過程導致其成本上升過快，相比之下社會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不能及時跟進，由此導致低收入群體不能公平享有作為個人（家庭）再生產所必須的發展需求。而這種發展需求困境的直接結果就是低收入群體因發展需求無法得到有效滿足而喪失了向上層社會自由流動的根本途徑，從而阻礙了社會階層自由流動而使社會階層等級結構分化，由此最終導致收入差距的惡性累積循環（如圖3）。這種收入結構向高收入階層傾斜又進一步導致低收入群體的相對挫折感甚至對現實經濟社會秩序的不認同感，由此形成社會對立，阻礙經濟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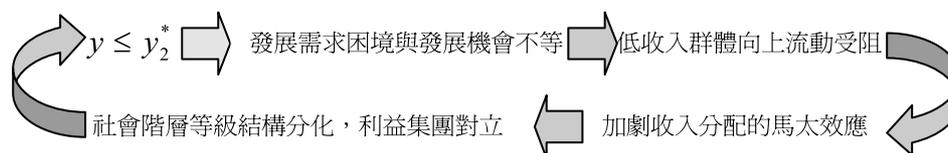


圖3 發展需求困境、社會階層分化與收入差距的累積循環

四、深度市場化與發展需求困境：基於中國現實的進一步討論

回顧歷史，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不僅鞏固了國家政權，而且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裏，用佔世界不到7%的耕地養活佔世界22%的人口，基本上解決了12億多人口的溫飽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推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隨著改革開放帶來的原有體制深刻變革（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所釋放的巨大能量，經濟的快速發展使整個社會的物質生產能力已經逐漸豐富，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然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過程不僅體現在一般產品方面，作為主要發展需求必需品的教育、醫療、住房等都以“高等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住房商品化”的形式直接捲入到市場化的行列。發展需求品的商品化、市場化過程使其成本不斷上升。

如果說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是一個身份社會，社會流動主要受阻於諸如人民公社制度和戶籍制度等的硬約束，那麼在今天這個已經較為開放性的社會中，社會流動主要受阻於經濟因素。在市場化本身必然帶來收入分配的“馬太效應”的情況下，發展需求成本的急劇上升使社會低收入群體失去了向上自由流動的根本途徑，發展機會的不均等直接導致了社會階層等級結構分化並固化，進而形成收入差距的惡性累積循環。住房價格不斷攀升使從農村到城市的城市化需求受阻，從而固化了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教育是任何一個國家社會階層自由流動和長期收入分配均等化最為可靠的政策，但教育成本的攀升以及教育資源的“殺貧濟富”使得社會低收入群體的人力資本投資需求受阻；醫療支出過高也導致了低收入群體的相對貧困化，並由此進一步導致低收入群體的相對挫折感甚至對現實經濟社會秩序的不認同感。

發展成本攀升過快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社會轉型的主要矛盾。無法滿足發展需求的低收入群體不斷擴張，由此也導致社會階層等級結構分化並固化，這也是社會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群體性突發事件增多等諸多經濟社會矛盾併發的根本原因，由此也直接危害到社會穩定和經濟的持續發展。這種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直接表現在社會低收入群體的不斷蔓延上，低收入群體已經從以往的農業勞動者階層向產業工人階層、一般工薪階層，甚至向知識失業群體蔓延，社會的相對貧困化不斷加劇，直接危及到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五、關注收入分配本身，還是滿足發展需求和機會均等

針對這種“內生因素決定的收入差距”，當前理論界和政府部門往往只關注收入

分配本身，政策措施也集中在採取“收入補救”的直接方法（諸如扶貧、增加農民等中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階層等）來提高低收入群體的絕對收入。然而，這儘管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低收入群體的窘困狀態，但卻不能從根本上滿足低收入群體的發展需求，從而也無助於培育低收入群體的“自生能力”，也就不可能通過起點的公平和機會的公平來打破收入結構的惡性累積循環（如圖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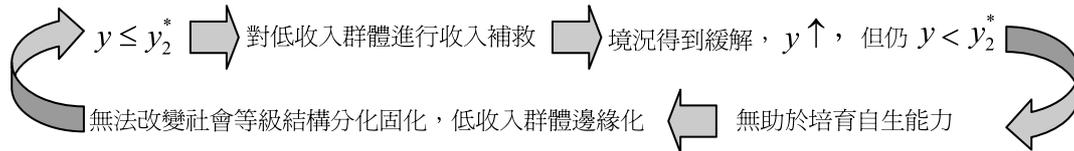


圖4 直接的收入補救措施及其結果

實際上，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等諸多社會顯問題的背後是社會低收入群體的發展需求無法得到滿足，由此也喪失了社會群體自由流動的根本路徑。政府在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上的政策舉措不應局限於關注收入分配本身的直接方式，而應通過為社會低收入群體提供機制化的福利服務使廣大低收入群體都能公平享有基本需求，進而使社會最廣大成員都能夠公平享有平等的社會參與和自由流動機會來間接實現社會收入均等化。亦即收入均等化最終需要通過“滿足發展需求⇒發展機會均等⇒社會階層流動機會平等⇒收入均等化”來迂迴實現（如圖5）。滿足社會最廣大低收入群體的發展需求是社會階層正常流動的根本保證，而社會階層正常流動、保證不同社會群體具有平等的社會參與的能力和機會，進而實現社會整合是實現收入均等化的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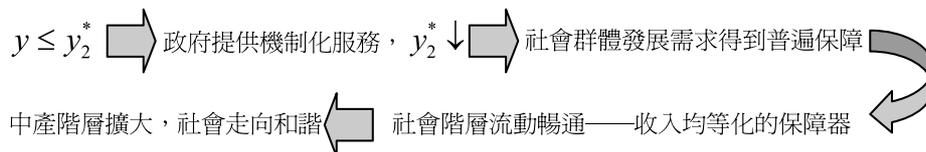


圖5 發展需求困境及其破解

為此，當務之急，破解當前收入分配難題的關鍵不僅在於通過收入補救來暫緩收入分配矛盾（必要而非充分的），更重要的是其長效機制在於在進一步規範收入分配秩序的基礎上，通過政府提供機制化服務手段來降低發展成本，使最廣大人民群眾也能公平享有發展需求和發展機會。這就必然要求政府切實承擔起保障基本公民權的職責，切實保障最廣大人民的基本需求，這種基本需求不僅是利用補救模式來消除絕對貧困，而應在現代經濟高度發達的條件下將福利功能延伸到營養、住房、健康和教育等諸多方面，用以保證廣大低收入群體的發展需求。

具體而言，必須強調發展需求品的社會屬性而非市場屬性。當前中國面臨的發展成本過高集中體現在城市化需求成本和人力資本投資需求成本方面，而最為突出的又是住房、教育及醫療等方面。政府不應對日益高漲的住房市場聽之任之，如果說現行商品化的住房價格高漲不可避免的話，那麼仿照香港和新加坡實行大規模的政府住房

計劃則勢在必行；教育是一個國家社會階層自由流動和長期收入分配均等化最為可靠的政策，要實現長期收入均等首先必須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化，這是社會低收入群體獲取公平的社會參與能力和自由流動機會的首要途徑。由此，隨著最廣大社會群體發展需求的普遍滿足，社會進入有序的結構轉型階段（在滿足發展需求條件下的消費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轉型、在滿足城市化需求條件下的城鄉結構轉型、在滿足人力資本投資需求條件下的人口結構轉型），進而使得整個經濟社會實現結構轉型和經濟增長的良性互動，由此也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和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現實經濟要求有一個強勢政府，但這種強勢政府的職能並不在於其經濟職能，而在於其社會福利的供給職能和公共服務的保障職能。

六、結論及政策含義

本文區分了兩種類型的收入差距——“外生因素決定的收入差距”和“內生因素決定的收入差距”。對於前者，當前理論界和政府部門給予了廣泛的關注，當務之急是進一步深化改革，消除行政壟斷、腐敗等外生因素對於收入分配的負面效應；對於後者，收入差距本身所必然存在的一種累積循環的內生機制，理論界則關注不足，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初始收入的不均等通過發展需求困境和社會階層分化最終將導致收入差距的累積循環，對於這種內生因素決定的收入差距，通過收入補救的直接方法是遠遠不夠的，其長效機制在於通過政府提供機制化服務手段來降低發展成本，使最廣大人民群眾也能公平享有發展需求和發展機會。這就必然要求政府切實承擔起保障基本公民權的職責，切實保障最廣大人民的基本需求，這種基本需求不僅是利用補救模式來消除絕對貧困，而應在現代經濟高度發達的條件下將福利功能延伸到營養、住房、健康和教育等諸多方面。

為此，必須強調包括住房、教育及醫療等發展需求品的社會屬性而非市場屬性，保障最廣大社會成員的城市化需求和人力資本投資需求，使之獲取公平的社會參與能力和自由流動機會，進而使整個社會進入有序的結構轉型——在滿足發展需求條件下的消費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轉型、在滿足城市化需求條件下的城鄉結構轉型以及在滿足人力資本投資需求條件下的人口結構轉型。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現實經濟要求有一個強勢政府，但這種強勢政府的職能並不在於其經濟職能，而在於其社會福利的供給職能和公共服務的保障職能。當前，我國正在加緊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物質生產能力的不斷豐富，進一步發揮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切實保障最廣大社會成員的生存需求和發展需求將是真正走向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這也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別於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的重要方面。

註釋

- 1 可參見李劍閣、吳敬璉、李稻葵、吳曉靈、范恒山、胡鞍鋼、孫立平、王建、張維迎、常修澤，《當前有關改革的幾個主要觀點》，《人民論壇》，2006第5期。
- 3 參見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pp.30-48。
- 4 西尼爾，《政治經濟學大綱》，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pp.38-52。
- 5 主流微觀經濟學教科書(費希爾、唐布希，1989，pp.130-131；馬歇爾，1983，pp.139-152)是將產品需求同收入水準聯繫起來，從需求收入彈性角度來區分不同的需求品。正常品是指需求的收入彈性為正的商品，低檔商品是指需求的收入彈性為負的商品。奢侈品是具有大於1的需求收入彈性的必需商品或非奢侈品具有小於1的需求收入彈性。本文則是從消費需求對於消費者的優先秩序來劃分的，二者是有所不同的。
- 6 在新古典研究範式中並未對家庭決策和個人決策做區分，家庭把它的收入按各種用途進行分配時，大致滿足邊際效用相等原則，亦即“經濟學家是不侵犯家庭私生活的”，本文也遵循這一研究慣例，消費者決策是指家庭決策。可參見加爾布雷思，《經濟學與公共目標》，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pp.35-43。
- 7 這裏對住房需求做一必要說明。此處的住房是指城市的商品化住房。對於城市居民而言，住房就不是發展需求品，而是生存必需品。對於農村居民而言，所在地的農村住房是生存必需品。這裏我們假設社會群體都有向上流動的意願，那麼對於廣大具有強烈遷入城市意願的農民及農民工而言，商品化住房無疑是其市民化的必要物質基礎，是一種發展需求品，可以稱之為“城市化需求”；同樣，較低層次的醫療和教育是生存必需品，但較高層次的醫療和教育則是在現代社會中為維持自身和下一代現時社會地位所必需的發展需求品，可以稱之為“人力資本投資需求”。由此，本文中發展需求品又可劃分為兩大部分，即城市化需求和人力資本投資需求。
- 8 在現代市場交換經濟中，生存需求、發展需求和奢侈需求成本均可用一籃子相關商品的貨幣價格表示。生存需求成本可以用糧食等基本消費品的價格表示；發展需求成本可以用住房、醫療和教育等的價格來衡量；奢侈需求成本可以用汽車、勞動服務(僕役)等價格來衡量。我國的現實狀況是以住房、教育和醫療等為表徵的發展需求成本過高，而相比之下以勞動服務價格為表徵的奢侈需求成本較低。
- 9 經濟增長現在來看是一個習以為常的詞語，但實際上經濟增長只是在近代才真正進入快車道的。正如庫茲涅茨(Kuznets, 1966)在其開創性著作的標題一樣，經濟增長是一種相對“現代”的現象。按照今天的標準，兩個世紀以前即使是最快的增長也是微不足道的。具體可參見Kuznets 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10 根據庫茲涅茨提出的“倒U型”曲線，英國大概在19世紀最後25年開始出現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縮減，美國和德國的這一過程大約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但這一過程不是自發實現的結果，根據他的觀察，後期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可歸結為城市地區不平等程度的下降，而這又是城市中農村移民後代對都市經濟更強的適應能力以及政治力量壯大的結果。由此可見，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農村人口的持續減少是收入差距縮小的先決條件。
- 11 這一點得到了社會學者相關研究的應證。陸學藝將當前中國劃分為十大階層。其中，國家於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處於優勢階層，很少向下流動。而處於中間位置的專業技術階層具有穩定性，辦事人員階層則可能向下流動，個體工商戶階層也很少向上流動，而處於基礎階層的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則是人數不斷膨脹的較低階層，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階層同是較低階層，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是底層階層。由此可見，包括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以及所有的基礎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都很少，進而不斷膨脹，形成社會階層的向下分化和收入差距的累積循環。參見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 ¹² 當前我國教育存在諸多問題，由於教育體制、教學內容與現實需求脫節，教育年限的“無限”延長不僅不利於人力資本的培育，相反高學歷還可能因為削弱人的冒險精神，從而導致企業家才能的喪失，並進一步導致企業不足，就業也就相應不足。而當前中國經濟所最匱乏的正是企業家人才和技術型人才，而非高學歷的學術型人才。這一點從當前大學生就業難，且多傾向於去政府部門、高等院校可見一斑。

參考文獻

- (1) 馬克思，《資本論》，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 (2) 凱因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
- (3) 加爾布雷思，《經濟學與公共目標》，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 (4) 西尼爾，《政治經濟學大綱》，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
- (5) 費希爾、唐布希，《經濟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
- (6) 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
- (7) 柳欣，《資本理論——有效需求與貨幣理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8) 周弘，《福利的解析——來自歐美的啟示》，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版。
- (9)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 (10) 李劍閣、吳敬璉等，當前有關改革的幾個主要觀點，《人民論壇》，2006第5期。
- (11) 唐茂華，工資差異、城市生活能力與勞動力轉移，《財經科學》2005年第4期。
- (12) Modigliani, F. and R. Brumbergh. (1955).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 In K. Kurihara (ed.),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13) Kuznets S. (1966). *Modern Economic Growth*.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4) Harold L. (1975). *The Welfare State and Equality: Structural and Ideological Roots of Public Expenditur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5) Blanchflower, D.G. and A. Oswald. (2000).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NBER Working Paper No. 7487, January.
- (16) Richard Titmuss. (1968). *Commitment to Welfare*. George Allan & Unwin Ltd..

Development Demand Dilemma and Accumulation of Income Disparity: an Intrinsic Mechanism

Tang Maohua

Abstract :

The paper distinguishes two types of income disparity which result respectively from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factors, whilst focusing on the latter. Income disparity in itself exists as a vicious cycle. One way to reduce income disparity 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social services to reduce development cost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majority of people are able equally to enjoy development demand and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us created.

Key Words:

Development demand dilemma, Social classes, Income disparity, Government functions